

马克思与福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两种超越

王雪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福柯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关联是当前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之一, 对这一议题的解答集中体现在二者对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两种超越之中。这两种超越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 就理论起点而言, 福柯沿袭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 将契约论传统中的“自然主义”置换为“历史主义”, 从而摆脱了“自然理性—统治权”框架的本质主义基底; 其二, 就理论范式而言, 近代政治哲学秉承的“权利范式”以法理论证和政制论证虚设了政治理想的“应然状态”, 福柯承接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资本权力论题, 以“知识—权力”范式内含的“解剖政治”“生命政治”与“政治经济学”的“三位一体”揭示了政治现实中生命为权力管控的“实然状态”; 其三, 就核心原则而言,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力图以“理性主体”为前提进行“政制建构”, 福柯则观察到权力对人的生物性存在的侵蚀, 以对“生命主体”的关注展开“治理术批判”, 从而延续了马克思批判性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福柯的政治哲学拓展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虽然无法呼应实践政治原则, 却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可能空间。

关键词: 马克思; 福柯; 政治哲学; 生命政治; 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6-0205-101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现状呼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回归, 也使得新自由主义批判者福柯成为学界探讨的热门人物。在这一背景下, 福柯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关联成为当前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可以集中体现在二者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超越之中。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性阐释被视为福柯基于“生命政治”的政治哲学的突出贡献, 正如埃斯波西托所说: “自从米歇尔·福柯提出并重新定义‘生命政治’(他并没有创造这个词)这一概念之后, 整个政治哲学的框架已然出现了深刻的改观。”^[1]福柯的这一贡献恰恰建立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呼应之上。1970年后, 福柯对政治哲学的思考贯穿在他以法兰西学院系列讲座为载体的研究中, 这种研究改变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框架。按照福柯的说法, 政治哲学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揭示并阐发“目前控制、压制或抑制着社会机体的政治权力之所有关系”^[2]。针对这一问题, 福柯延续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总体规划, 立足于谱系学方法, 从历史实践的具体形态及其合理性出发, 对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起点、问题范式与核心原则进行了置换与重构, 从而实现了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超越。这三个层面的理论建构印证了福柯与马克思之间的政治哲学关联, 可以说, 马克思是福柯政治哲学中“不在场的在场者”。本文试图从思想史的维度厘清福柯在什么意义上超越了自由主义, 追问福柯政治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要素及其理论张力, 并以此探寻当代政治哲学发展的新增长点。

收稿日期: 2024-12-21; **修回日期:** 2025-05-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的微观视角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2CZX013);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视域下的资本权力批判思想研究”(21ZXC001)

作者简介: 王雪, 女, 吉林长春人, 哲学博士,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社会批判理论, 联系邮箱: wangxue@nju.edu.cn

一、从自然主义到历史主义：理论起点的置换

纵观政治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均以一个默会的预设作为理论起点：政治是一种合理性的人类生存方式，政治哲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概言之，当代政治哲学作为一种规范性政治哲学话语体系，预设了人类的政治秩序大体上在自然理性的框架之内。相较于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内在复兴，福柯并不关注“宪政何以可能”的传统问题，而是追问“在奴役程序的层面上，在奴役的时刻，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3](32)}。换言之，福柯试图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机制，即“生命”何以被“政治”与“权力”所捕获的实际历史。这种理论建构承接了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福柯借此完成了对政治哲学理论起点的置换，由契约论传统的“自然主义”转向谱系学传统的“历史主义”。

一般来说，自然主义的核心是自然理性，自然理性及伴生的自然法是近代政治哲学理论阐释的基石。其理论奠基人首推自由主义者霍布斯，在他看来，自然理性既是出于上帝旨意的天赋原则，又包含一系列可为人所知并具有约束力的实践准则。霍布斯创造性地将这种自然理性的发生从神的视域转移到人的视域，其根本关切在于个体自我保存的欲望，这是正义和道德的根源，也是自然法则和政治原则的基础。霍布斯发现，在人类现实生活中，“自我保存”的理性与“人与人为敌”的原始状态相冲突，为了自我保存，人们必须以签订契约的形式建立具有威慑力与公信力的共同权力，将全体人的集体意志凝聚在唯一人格之中。霍布斯将其称为“利维坦”，“我们在永生不朽的上帝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安全保障就是从它那里得来的”^[4]。这样一来，霍布斯从对自然理性的论证引申出利维坦存在的合理性，并以集体意志为利维坦赋予灵魂。统治权的合理性来源于此，所有的权力机制与法律契约都围绕着这一中心权力而建构。

霍布斯“自然理性—统治权”理论奠定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框架，即从先验的理性原则推导出世俗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这一框架落地为“统治权的法律模式”，后续的洛克、卢梭、亚当·斯密等自由主义者对市民社会的政治分析都不自觉地延续了这种模式，“它实际上把个人预设为自然权利或原始权力的主体；把认识理想化的国家诞生当作自己的目标；最终，它使法律成为权力的根本表现”^{[3](289)}。于是，统治权的合理性问题被置换为统治权行使的法律问题，统治的暴力本性被掩盖了，政治哲学成为变“非法”为“合法”的语言魔术。正如阿尔都塞所批评的那样，“他们没有建立一种关于现实历史的理论，而是建立了一种关于社会的本质论”^{[5](12)}。

福柯出于对他所处时代的“黑暗遗产”——法西斯主义——的反思，承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分析，直面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基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社会问题的调查使福柯更加熟悉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语汇。福柯将这种理论倾向注入对“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血缘关系的分析中，“在很多点上，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延续了一系列在西方政治和社会体系中已经存在的机制”^{[3](302)}。“自然理性—统治权”的架构正是这种血缘关系的表征。“自然理性—统治权”预设了三重“原始性”——“要受奴役的臣民，要建立的权力统一体和要遵守的合法性”^{[3](46)}，它的目标是以统治权术话语为权力辩护。这种架构下的政治哲学无法切中真实的政治实践，只是对抽象权力话语的空洞重复。因而，政治哲学正当的理论起点不是表征“合法性”维度的自然理性，而是揭露权力实施奴役程序的历史实践，这样才能“使统治问题和奴役问题取代统治权和服从问题彰显出来”^{[3](31)}。基于此，福柯以谱系学方法重拾了对“真实历史”的追求。

20世纪70年代，受到现实中“五月风暴”与理论界法国马克思主义“尼采转向”的双重影响，

以进入法兰西学院并发表《话语的秩序》为标志，福柯的研究方法由知识分类的考古学向知识生产的谱系学转变。谱系学方法的内核就是反对传统哲学中的总体性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将历史视为一个服从总体性目的的形而上学实体，“自然理性—统治权”的框架正是遵循了这样的逻辑。福柯认同尼采的观点，即理性不过是偶然产生的结果，自由不过是统治者维持自身统治的发明，传统自然主义话语从起点处就值得怀疑。事实上，自然理性背后的秘密是，“这些事物都没有本质，或者说，它们的本质都是一点点地从异己的形式中建构出来的”^[6]。传统政治哲学的叙事方式是将政治实践抽象化为一般概念，有序纳入一个合理化的历史叙事，以服务于论证统治权合法性的隐秘目的，而不能服务于这一目的的真实历史则被自然理性遮蔽。“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力量既不遵循目的，也不遵循机械性，它只顺应斗争的偶然性。”^[7]主导历史与文明向前发展的恰恰是社会现实力量的相互博弈，自由主义的宏大叙事以理性的名义掩盖了这一过程，从而掩盖了处在历史斗争之中的群体与阶级。福柯以谱系学方法翻转了霍布斯对于“人与人为敌”的原始状态的设定，并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改造成“政治是内战的延续”^{[8](29)}。这句话的意思是，霍布斯设定的原始战争状态并不是真正的战争，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自然主义契约代表着一种新型权力机制，是这种战争的另一种形式。福柯直白地指出：“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处于社会的战争中——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是富人与穷人对抗的战争，所有者和一无所有者对抗的战争，雇主和无产者对抗的战争。”^{[8](21-22)}霍布斯所描述的“人与人为敌”的原始战争，实质上是对基于财富分配的社会内战的抽象表达，这种抽象表达所塑造的恰恰是社会生产中的无产者与工人，任何“敌对或反对生产的最大化原则的人”^{[8](47)}都被视为社会的敌人。

基于福柯的上述观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调查的深入和斗争形势的严峻，福柯的问题意识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分析框架。福柯借助尼采的谱系学方法将政治哲学的分析起点重设为被抽象逻辑遮蔽的历史真相，而他对尼采谱系学方法的利用恰恰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介完成的。福柯将政治哲学的理论起点指向社会斗争与权力关系，政治哲学问题被转换为揭示社会生产斗争中的权力关系问题。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以“自然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充斥着抽象与虚妄。在德法年鉴时期，青年马克思就已经看到市民社会中的公民“过着双重的生活”^{[9](30)}，从而看到了自由主义政治本身已然成为资产阶级掠夺私有财产的手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立足于“现实的个人”及其社会生产之上，并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与其他自然的关系”^{[9](519)}。他从生产关系维度揭示社会历史的变革，并锚定了社会生产这一政治哲学原点。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逐渐明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逻辑，将政治哲学内含的社会生产斗争具象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这样一来，马克思以阶级斗争话语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予以批判性解剖，并对政治哲学的理论起点与核心要义进行重塑，即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阐释了经济关系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事实上，从这一角度来看，福柯的政治哲学延续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路，将对现代权力关系的探讨置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与现实这一宏大背景之中。与马克思不同的是，福柯着重补充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维度，正如南希·弗雷泽所指出的那样，他将权力关系的分析定位在“扩大再生产”上^[10]，从而描述了权力的独特现代样式。由此，福柯的历史主义谱系学超越了尼采谱系学的空洞论述，而这一点恰恰是借助与历史唯物主义“策略上的联姻”^[11]而实现的。这种历史主义将政治哲学的分析指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3](37)}，探讨政治架构中“臣民”何以被各种异质的权力机制捕获。可以说，这种历史主义是福柯在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对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与补充。

要言之,借助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资源,福柯超越了尼采的虚无主义历史观,并摆脱了传统政治哲学的本质主义基底,从而完成了对政治哲学理论起点的重置。福柯的历史主义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置于社会生产之上,以社会治理的历史真相取代传统政治哲学的抽象逻辑。从历史主义的理论起点出发,政治哲学的目标不再是基于理性原则对法律、权利等观念进行论证和补充,而是揭示资本主义权力体系对个体乃至群体的塑形。理论起点的置换使福柯更新了政治哲学的理论范式,将传统政治哲学中论证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权利范式”变革为揭示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知识-权力”范式。

二、从权利到“知识-权力”:问题范式的变革

“权利范式”是启蒙政治哲学家分析政治问题的基本范式,以权利对抗权力,以权力保卫权利。权利的核心是财产权,这是资产阶级经济诉求的具象化表达。地理大发现之后,商业资本与市场机制逐渐渗透到西方社会的治理中枢,如何满足财富欲望成为时代主题。在这一时代主题下,霍布斯以“自我保存”的自然理性与“人与人为敌”的原始状态勾勒出作为权力体的利维坦,突出了“以权利对抗权力”和“以权力保卫权利”的重要性;洛克则从财产权的维度完善了“权利范式”,将财产关系的博弈作为建构政治哲学的前提。在自由主义的谱系中,“权利范式”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秩序设计的基本原理。由这一范式主导,自由主义者将“权利”视为政治理论的核心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个人权利优先于共同体的建构,所有的政治实践仅仅作作为政治理念的个例和摹本而存在,不再具有史实和事实意义。正如阿尔都塞所引用的卢梭的批评:“他们只关心权利,也就是说只关心应当是什么。事实对他们来说,只是行使这种权利所需的素材,就像是这种权利存在的单纯诱因和反映。”^{[5](22)}基于“权利范式”建构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无法避免的双重缺陷:在理论上,自由主义者过度强调权利话语的完善性,最终将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统一还原为正义问题与道德问题;在实践上,权利理念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造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政治哲学变成为政治权力背书的工具。权利导向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无法解决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却以权利之名掩盖了权力的奴役机制。

自1970年起,福柯“将全部思考重心集中于发生在资本主义统治形式内部的深刻变形——生命政治治理”^[12]。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福柯承接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资本权力批判”议题,创造性地发现,在资本主义驱动的现代 society,“权利范式”所代表的仅仅是政治想象,这种政治想象以“知识-权力”的生产掩盖了资本权力的剥削与奴役,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借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资源,福柯以“知识-权力”范式揭示了资本主义架构下知识与权力的双向互动,即以权力生产知识,以知识巩固权力——这是现代性权力(支配)机制的关键。在福柯看来,治理实践中的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具体表现为解剖政治、生命政治与政治经济学的“三位一体”,资本主义借此实现了对个人乃至群体的规训与管控。

在法兰西学院系列讲座中,福柯揭示了个体与群体两个层面的“知识-权力”机制。对于个体层面的“知识-权力”的讨论集中在1975年的《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指出,从18世纪开始,出现了一种关于个体的系统知识,“为了控制人和使用人……对细节的仔细观察和对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时出现了,与之伴随的是一整套技术,一整套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中产生了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13]。这种知识以纪律、层级监视和规范化裁决等为手段,通过尽可

能精确地划分时间、空间、身份和活动来实现对个体的“细节”层次的管控，将个体的生命力量全部整合进资本生产的过程中，实质上是一种“解剖政治”。借助“知识-权力”的新话语体系，个人被权力体系塑造为生产力，个人既是社会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原子，也是“解剖政治”技术制作出的生产单元。福柯从1976年年末开始系统思考关于群体层面的“知识-权力”机制，他从安全机制的特征入手，揭示了权力形式由个体向群体的延伸。安全机制与规训机制一脉相承，是资本主义权力机制的重要工具。福柯发掘出一个传统政治哲学从未关注的主体——人口。人口这一概念具有双重功能，既“由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编织而成”，又“作为人的自然属性而发挥作用”^{[14](29)}。从人口的双重功能出发，“知识-权力”机制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人口的治理需要凭借对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干预。这种干预使得与宏观经济发展相关的知识(如统计学、免疫学等)被导入治理术，出生率、死亡率、寿命等成为知识关注的首要对象。福柯将这种针对群体的“知识-权力”机制称为“生命政治”，借助生命政治，资本主义权力机制以科学为依托实现了对群体的规范与调节。

福柯以“解剖政治”和“生命政治”阐释了资本主义“知识-权力”的两个层面。在1976年的《必须保卫社会》演讲的末尾，福柯更为清晰地揭示了“知识-权力”对传统权力类型的变革：“使人死”的权力转变为“使人活”的权利^{[3](264)}。福柯发现，两个层面的“知识-权力”构建都紧扣着一个知识领域，即政治经济学，解剖政治、生命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位一体”。在这里，福柯对资本主义“知识-权力”的“三位一体”机制的分析，恰恰在新时期延续并回应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资本权力批判命题。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15]，实质上是对资本权力经济运作原理的展示。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逻辑与历史结构而作出的病理学诊断。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创造财富的劳动表现为与“他人的财产”相对立的“他人的劳动”^[16]。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一旦进入生产领域，资本家就可以通过预付工资获得对工人的支配权，并攫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对于雇佣劳动而言，形式平等的法掩盖着实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存在方式的批判。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17]。因此，解剖资本关系主导下的权力关系，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政治哲学诉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着重论述了在资本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的权力形式变革，即权力明显从具象化的政治权力转换为抽象的经济权力，这种权力形式以平等之名造成了更隐蔽的剥削。

福柯的“知识-权力”范式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造性阐发。如果说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宏观经济结构，那么福柯则以“知识-权力”范式描绘了资本再生产层次的权力渗透机制，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焦点发生了转移。雅克·比岱指出：“知识权力概念是福柯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它并不论及资本家，而论及‘权能者’……知识权力是一种内在于所有制度的横向因素……所有被现代知识权力所掌握和生产的因素。但是由他们所共同实现的驯服与生产力被认为是导向它们所可能产生的最大剩余价值。”^[18]比岱准确地抓住了“知识-权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密切关系。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切入对“知识-权力”机制进行了分析，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知识工具是对资本主义新权力类型的理性化表达。福柯发现，正是借助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的权力机制实现了对整个生命的全方位介入和隐性干涉。首先，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就是能够确保治理理性做出自我限制的东西”^{19}，以知识为名约束了传统权力形式的强制力量。其次，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是一种将治理实践装扮成自然法则的治理技术。通过将自然法则与真理联系在一起，一切对治理实践的怀疑都被视为违背真理。最后，政治经济学作为治理理性与真理的连接点，将市场规定为形成真理的场所，商品交换成为根本原

则,经济价值成为治理和真理的基础。于是,市场从经济机制拓展为真理机制,资本主义的新权力机制正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知识-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在这种“知识-权力”的加持下,人的经济化和社会的企业化成为治理实践的新手段,个人利益的获取成为治理个人的调节性原则,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社会政策成为治理的中心问题,经济发展的一切要素都被纳入权力技术的监管范围。这种经济治理伴随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资本主义权力机制以自由之名实现了对整个生命的全方位介入和隐性干涉,“权力经济学”主宰了社会发展的一切。

福柯以“知识-权力”范式揭示了解剖政治、生命政治与政治经济学的“三位一体”,从而实现了资本主义治理机制的全面剖析。在这一过程中,福柯在原则与方法两个层面上与马克思保持了深层的一致,“这种批判真正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基始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商品-市场运作机制的透视”^[12],同时又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补充了一个关键部件,即“知识-权力”的生产,从而扩展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主题。福柯以“知识-权力”范式引导人们重新关注政治哲学的现实向度,“权利范式”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自我辩护的伪善说辞。“知识-权力”范式从逻辑上宣告了传统政治哲学中理性主体的消解,也宣告了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政制建构”的失效。在“政制建构”失效之后,福柯以新的核心原则规划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建构,这个核心原则就是治理术批判。

三、从“政制建构”到治理术批判:核心原则的深化

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政制建构”伴随着现代性事业的发展而确立,其内核是“不再希望天堂生活,而是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上建立天堂”^[20]。这种“纯粹的人类手段”即理性主体以“政制建构”的方式调节各种现实矛盾,建构理想社会。

从哲学史的脉络来看,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宣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开始,“政制建构”就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得到了扩展与发挥,我们一般将其追溯到霍布斯和洛克,他们构建了理性主体与“政制建构”的形而上学关联,并以“利维坦”与“有限政府”奠定了现实政制的设计蓝图。他们都相信,理性主体能够将欲望之下非理性的自私自利转变为理性计算的开明选择,这是政制落地的保障。强调“政制建构”与“理性主体”的必要关联也成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部分。德国古典哲学对近代政治哲学“政制建构”的核心原则进行了理论升华。其中,康德以其批判哲学为自由主义的“政制建构”奠定了先验基础和崇高理想,又从认识论的角度补充了理性主体的政治维度;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创了先验问题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这一政治哲学新平面,强调理性与主体的绝对统一。这样一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政制建构”为核心原则完成了对现代性事业的筹划,并在形而上学层面塑造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意识,理性主体可以凭借理性祛魅一切权威与神秘力量,通过参与“政制建构”捍卫自身的天赋权利,获得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如果说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西方政治哲学建立在理性主体的“政制建构”之上,那么,当西方现代哲学进入20世纪,这一核心原则就频繁处于危机之中。两次世界大战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宣告了现代性迷梦的破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政制建构”并没有实现对理想社会的承诺,取而代之的是现实政治的动荡与实践革命的挫折。鉴于难以克服的现代性困境,现代哲学逐渐开启了一条反理性主义的道路,这为福柯的出场奠定了基础。对于福柯而言,纳粹主义与极权主义的产生、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都意味着传统政治哲学无法切中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现实政治问题,“政制建构”

只是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承诺。福柯延续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思路，以治理术批判深化了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在治理术批判的维度上，福柯发现，理性主体已然在政治现实中沦为“臣服主体”，福柯以对“生命主体”的关注完成了对主体的重塑，从而在新自由主义初现之时完成了批判性政治哲学的当代建构。

从1978年开始，福柯以治理术的视角重塑现代政治的“发生史”，并通过历史主义的理论起点与“知识-权力”的分析范式来解剖自由主义。在福柯看来，从治理术批判的维度出发，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政制构建”实质上是“权力技术和它们的对象之间不断运动的游戏”^{[14](99)}，游戏的规则是用“多边利益和效用原则来调管个人、行为、语言、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想要操控的一切”^{[19](4)}。自由主义治理术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自由市场的运转、出于效用考量对治理进行限制以及生命政治的权力运作。这三项内容将计算、制度和程序策略等要素编织成总体，以运行复杂的权力技术。“这种权力形式的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14](140)}“政制构建”原则看似尊重法律主体和个体的创造性自由，实则唯一的目标是“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19](5)}。以动态化治理实现整个社会的相对安全，是资本主义政治借以调节权力组织合理性的手段，“在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核心处暗含着‘自由的生产/毁灭’的关系”^[21]。同时，“政制构建”推崇的自由本质上是“人和东西的行动、迁移和流通的自由”，应该被纳入“权力技术的更替和转换之中来理解”^{[14](60)}。换言之，这种自由更多的是经济自由，是受规范、受约束的治理关系下的社会自由，更是资本主义治理术得以施行的必要条件。

从对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批判性分析出发，福柯强调依托“政制构建”形成的“理性主体”并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资本主义治理术塑形的产物，其建立方式是“给人自身以科学理性地位”与“‘分离实践’中对主体的客体化”^[22]。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人文知识与意识形态对主体所谓的本质进行定义，另一方面借助权力实践将“理性主体”与“非理性主体”分离，并以各种权力技术将主体塑造为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驯顺个体。个体被形塑为辅助权力链条运转的工具，“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3](33)}。理性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型，主体是服从资本逻辑的“臣服主体”，理性主体无法承担解放政治的哲学期许。这宣告着传统政治哲学核心原则的失效，既无法切中现实，又无力提供未来规划，最终只能沦为资本主义政治本身的空洞重复与无病呻吟。

对治理术的剖析使福柯注意到一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视而不见的现象，即“人的自然生命越来越被纳入到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中”^[23]。福柯以对“生命主体”的关注发出对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批判与抗议，“生命主体”不仅包括福柯早期关注的具有非理性特征的疯人、病人、罪犯等边缘群体，更涵盖“知识-权力”背景下被权力机制和经济原则所侵蚀的普通大众。他们是治理体系中被有意忽视的“他者”，其存在仅仅以“肉体”“人口”等抽象语汇被记录。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哲学以理性主义叙事将“生命主体”置于“政制建构”中的例外状态，又以对“理性主体”的过度强调掩盖了权力对自然生命的奴役与形塑。在福柯看来，政治哲学的真正使命就是揭示权力治理关系中存在的这种奴役与形塑，“重新恢复作为人的基本需要和具体本质以及实现其潜能和全部可能性的生命”^[24]。

福柯对生命主体的强调深化了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从而延续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主题。我们可以看到，福柯对生命主体的关注与马克思有异曲同工之妙。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就已经注意到，国民政治经济学“把人变成帽子”^{[9](597)}，“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9](171)}，仅仅将生产者作为“抽象的个人”加以把握。正是出于对生命主体的本然关怀，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的异化状态，并意识到资产阶级无法成为承担解放政治任务的革命主体，从而赋予了无产阶级解放人类的重要使

命。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互释,点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内容,即资本主义生产力必须扬弃自身作为资本力量对人的敌视,转换为从属于人的自我发展的真正社会力量。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主体话语为其政治哲学建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不仅从理论批判层面彻底否定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理性主体”与“政制建构”的作用,也在实践批判层面上锻造了能够击毁现实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构筑了以现代性批判为理论基础的政治哲学总体规划。而福柯的治理术批判与对生命主体的关注恰恰是对马克思这一政治哲学规划的延续,虽然他的政治哲学并没有落脚到阶级话语,但是他用谱系学方法描绘了无产阶级被塑造的历史,并以对监狱、医院等特殊场所的关注扩展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从不同维度回应了马克思的阶级问题,从而与马克思关于解放的政治哲学产生了某种深刻的一致性。但让人惋惜的是,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与复杂的革命形势,福柯最终将对主体的重塑置于伦理学维度。在1981年至1984年以《主体解释学》和《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为代表的四个演讲录中,福柯试图从古希腊哲学中寻找“主体何以可能”的答案,以“*parrhêsia*”(说真话)概念走出一条不同于马克思的主体建构道路,即“人把自己转变为主体”^[22],回归生命的本然。在主体重塑方面,福柯转向了基于古典研究的自我伦理学,希望通过“*parrhêsia*(说真话)”形成个体对真理的多元表达与实践,从而实现伦理主体的自我塑造。福柯强调:“关心说真话的重要性,知道谁能说真话,知道为什么我们该说真话——我们在另一面向上所拥有的,可以称之为西方的‘批判’传统之根源。而在此你将看出我在这门研讨课中的一个目标,就是建构出西方哲学中批判态度的谱系。”^[25]根本而言,福柯晚期所建构的是无法切中现实的伦理主体,这种伦理主体内嵌一种犬儒主义式的架构,使得多元性的抗争局限在日常生活偶发的标新立异层面,而无法从外部颠覆资本主义的权力体系。在现实层面对革命前景的绝望使得福柯脱离社会现实批判,而遁入空洞抽象的美学与伦理学思辨。

总而言之,福柯以对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剖析和对生命主体的关注,瓦解了自由主义基于理性主体的“政制构建”原则,从存在论的维度延续了马克思的批判性政治哲学,深化了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虽然福柯最后将政治哲学诉诸伦理主体的美学重构无法呼应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政治原则,但是在新自由主义主导欧美政治哲学话语体系的背景下,福柯在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回归。

四、结语

福柯以理论起点的置换、问题范式的变革与核心原则的深化来呈现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建立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地基之上,显示出规范性政治哲学与批判性政治哲学之间的张力,指向福柯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关联。从逻辑起点看,二者都从揭示社会生产中的财富斗争出发,探讨资产阶级政治与经济的压迫性;从阐释原则看,二者都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架构;从理论效果看,二者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发展阶段的规律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与批判。在马克思的基础上,福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形态,挖掘出资本逻辑背后的隐秘生命治理机制,从权利问题转向权力问题和主体问题,从“政制建构”转向治理术批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重构了批判性政治哲学。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现实的人及其生存境遇的关切、实现普遍自由与人类解放的追求都构成了福柯最为直接的理论资源——马克思是福柯政治哲学中“不在场的在场者”。

我们也需要注意二者之间的理论差别。与马克思立足于阶级话语的实践政治原则不同,福柯重建主体的“伦理转向”标志着政治哲学与现实的全然脱节。这种脱节意味着,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体系,

福柯在“反抗无望”的悲观心态下把反抗的内核转化为“说真话的勇气”，以话语反抗替代了现实反抗，指向现实和行动的解放政治蜕变成空洞抽象的美学与伦理学思辨，反抗的战场从街头撤退到学院，其政治意图也变成了“仅仅是让人们听到一声呼唤”^[26]。这样的政治哲学缺乏现实力量。沿着福柯政治哲学“权力—主体”的思想主线，当代激进左翼学者阿甘本从“法之例外”结构延伸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由此建构了法权范式之上的“死亡政治”。意大利学者奈格里则以“非物质劳动”开发了“诸众”的创生潜能，建构出生产范式之上的“生命政治”。无论是消极的死亡政治，还是积极的生命政治，都延续了福柯政治哲学“现实无力”的理论特征，二者都无法在新时期真正实现主体的自由与解放。当代理论的困境呼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回归，只有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及其所蕴含的实践逻辑，将主体自由的实现置于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才有可能真正变革旧世界，开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参考文献：

- [1] ESPOSITO R.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M].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13.
- [2] FOUCAULT M. *De la nature humaine: Justice contre pouvoir*[J].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rd, Paris, 1994: 493.
- [3] 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M]. 钱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4] 霍布斯. 利维坦[M]. 黎思复, 黎廷碧,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32.
- [5] 阿尔都塞. 孟德斯鸠: 政治与历史[M]. 霍炬, 陈越, 译.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20.
- [6] 刘小枫, 倪为国. 尼采在西方: 解读尼采[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 282.
- [7] 杜小真. 福柯集[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 157.
- [8] 福柯. 惩罚的社会[M]. 陈雪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汪民安, 等. 福柯的面孔[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131.
- [11] 莱姆克. 马克思与福柯[M]. 陈元, 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
- [12] 张一兵. 回到福柯[J]. *学术月刊*, 2015, 47(6): 35—41.
- [13]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2: 160.
- [14] 福柯. 安全、领土与人口[M]. 钱翰, 陈晓径,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5.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00.
- [17]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6: 283.
- [18] 比岱, 林青. 马克思经由福柯得以再造?[J].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014(00): 46—61.
- [19] 福柯. 生命政治的诞生[M]. 莫伟民, 赵伟,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20] 刘小枫.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 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 卷二[M]. 彭磊, 丁耘,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33.
- [21] 王鸿宇, 蓝江. 资本主义治理逻辑的历史性考察: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6): 158—167.
- [22] HUBERT L. Dreyfus,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second edition with an afterword by and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208.
- [23] 阿甘本. 神圣人: 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M]. 吴冠军,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163.
- [24] 福柯. 性经验史[M]. 余碧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94.
- [25] 福柯. 傅柯说真话[M]. 郑忆恺, 译. 台北: 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05: 229.
- [26] 德里达. 《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M]. 胡继华, 等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9.

Marx's and Foucault's two kinds of transcendence of liberal political philosophy

WANG Xue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oucault's and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i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current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answer to this topic is embodied in the two kinds of transcendence of liberal political philosophy achieved by the two. These two kinds of transcendence are carried out around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in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Foucault inherited Marx's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replaced the "naturalism" in the social contract tradition with "historicism", thus getting rid of the essentialist foundation of the "natural reason-sovereignty" framework. Second, in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the "right-based paradigm" adhered to by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fictionalizes the "ought-to-be state" of political ideals through legal argumentation and political system argumentation, while Foucault, inheriting the theme of capital power in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eveals the "actual state" in political reality where life is controlled by power, with the "trinity" of "anatomy-politics", "bio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contained in the "knowledge-power" paradigm. Third, in terms of the core principle, liberal political philosophy strives to carry out "poli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on the premise of the "rational subject," while Foucault observed the erosion of power on human biological existence, and launched the "critique of governmentality" with a focus on the "biological subject", thus continuing the core theme of Marx's crit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Foucaul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xpands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opens up a possible spa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although it cannot correspond to the principles of practical politics.

Key words: Marx; Foucault; political philosophy; life politics; liberalism

[编辑: 胡兴华]